

贵州新文学大系

散文·杂文

报告文学卷

1919—1989

贵州人民出版社



22/8.73
8

I 22/8.73
10/6

贵州新文学大系

(1919——1989)

散文卷

贵州新文学大系

散文卷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设计:石俊生

版式设计:邹刚 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 话:(0851)6828570

社 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码:550004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434 千字

印 张:17.5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7-221-04049-4/I·887

定 价:27.60 元

《贵州新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塞先艾 龙志毅 黄 瑶

主 编：

胡维汉 张 克 卢惠龙

执行主编：

尹伯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王良范	王鸿儒	尹伯生	井绪东
艾筑生	卢惠龙	朱吉成	何士光	何光渝
何积全	余未人	陈锐锋	张 克	张 劲
张建建	周飞燕	杨胜利	胡维汉	夏 凡
徐 达	莫贵阳	秦家伦	鲁令子	彭晓勇
戴明贤				

总 纂：

尹伯生 井绪东 秦家伦

引言

尹伯生

从1988年倡议编写本书到现在全部定稿，前后有八个年头了。前四年多时间，主要进行各方面的筹备工作：诸如选聘编写人员，研讨修订编写提纲，以及筹措经费、协商出版事宜等。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协调和解释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即对贵州文学七十年实绩如何认识？对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的意义和价值作何估计？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贵州文学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长期以来又少有在全国知名度高的作家，和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诚然，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是有先进滞后之别的，但这抹煞不了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的客观存在，和它自身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历史。我们从史料中发现，早在三十年代也曾经有过诸如“贵州无文学”之类的妄语见诸报端。这显然是对贵州历史无知的一种自卑心理。事实上贵州文学的历史绝非一片空白。这里对明代的孙应鳌、清初的周渔璜等姑且不论，而清代道光以后出现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诸家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曾在全国名噪一时；而在抗战时期，除了众所周知的由于众多国内文化名人旅居贵阳而一度呈现的文化繁荣景象，却往往忽略了与此同时，在旅外归来的蹇先艾、谢六逸等的积极倡导推动下，贵州本土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极为活跃，并且涌现出了大批青年文学作者，形成了贵州本土文学的发展繁荣局面；及至八十年代在全国产生了影响的贵州文学新崛起，这些都是贵州文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尊重贵州文学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

地肯定贵州文学的历史实绩，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有利于促进贵州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当是毋庸置疑的。

从而，我们把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的目的和任务确定为：展示贵州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为研究和促进贵州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做一点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

《贵州新文学大系》有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体相同的格局：按文学门类分卷，每卷包括一篇概论性文章，和该文学门类的作品选。但本书又有它自身的特点：由于本书所包容的时间跨度长，即从1919—1989年。在漫长的七十年中，各门类文学当有符合自己特点的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求各卷的概论性文章采取似史非史，史论合一方式，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观点，展示不同历史阶段各文学门类的面貌，分析各门类文学的创作发展特征，评介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各卷作品选的入选标准，当然首要是“择优”，但同时也强调注意“择要”。由于“择优”和“择要”两者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入选作品主要是不同发展阶段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之作，但就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看，就不见得是他的最佳作品；还有某些作品则主要着眼于它在不同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入选，其中大多也是当时的优秀之作；至于少数即便非属上品，但其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价值却也弥可珍贵，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贵州文学七十年间所创作的作品何止万千！各卷作品选的选编诚然主要取决于各位选家的眼光。他们通过广泛搜集，认真研读，缜密思考，最后才遴选出入选作品；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择优”“择要”的入选标准，和“避免因人取文或因人废文”的要求，尤其是严格的篇幅限制，因而各卷作品选虽几经权衡斟酌，某些取舍得失之憾恐仍不能尽免。

在几年的编写实践中，我们逐步明确并适当调整了一些涉及

编写工作的具体问题：

关于资料搜集。从开始筹备工作，我们就登启事，发信函，要求广大作协会员提供个人创作资料，得到多数会员的支持，但由于诸多原因，无法求全。与此同时，各卷分头进行搜集，到有关单位查阅翻检报刊资料，特别是解放前的报刊资料，这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或是没有，就是有也不让翻检，三是好不容易找到有用资料，又不许个人复制……这无疑更增加了搜寻的难度。至于千方百计发掘线索，跟踪追寻，搜求一个不应遗忘的作家，一部曾经产生影响的作品，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们来说就更加难能可贵。本书现代文学部分发掘出一批鲜为人知的作家，和长期被湮没的作品，突破了所谓“文革”前贵州没有中长篇小说的错误说法，这在文化积累上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尽管编写组同志为了追求翔实的资料，抱着强烈的责任心，作了艰苦努力，事实上却仍难求全，只有留待有心的研究者继续搜寻，不断补充。

关于概论性文章。对全书共三十万字的概论性文章，不仅要求通过宏观把握，勾勒出各个时期文学创作面貌，并且要对作品作具体的评价分析。这就面临着对作家、作品，尤其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选择取舍，评介轻重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同时对各阶段文学现象的认识和评估也必然存在见仁见智情况。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失当，本书明确规定不给作家立传，不对作家的整个创作进行总体评价，而只对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品作实事求是的评介。同时决定各卷的概论性文章采取笔者个人署名形式，表明是“一家之言”，从而给进一步研究探讨留下更大余地。

关于作品选。本书包容的时间跨度大，面对的作家作品数量也就相当庞大。在有限的篇幅内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尽可能扩大入选面，除诗歌、杂文等短小作品不限入选件数外，其它作品除了少数重点作家，一般情况是一人入选一件；对一些篇幅过大的作品采取

节选方式；对从事多品种创作，影响较大的作家，应突出他的主要创作品种，对次要品种作必要的取舍。尽管全书作品选近二百八十万字，入选作品达七百余件，遗漏仍然难免。

关于本书的分卷的体例不一问题。这主要是有的卷所包容的时限不同。当代文学各卷是分别文学门类论评解放后四十年（即1949——1989）的贵州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卷是对解放前三十年（即1919——1949）贵州文学各门类的论评，而文论卷则包容了1919——1989七十年间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评析。

有关入选对象和范围的一些问题。长期在贵州生活工作的外省籍作家，其创作和文学活动对贵州文学有相当影响的应列为本书编选对象；而长期在外省生活的黔籍作家，由于资料搜集困难和篇幅所限，除现代文学卷和文论卷的现代文学部分已收入部分全国著名黔籍作家的作品、文章外，本书当代文学部分均未收列。

鉴于民族民间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都已成立了专门协会，因此，以贵州省作家协会名义组织编写的本书，不再包括民间文学、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

另外，旧体诗词、革命回忆录、作家书简、以及外国文学译著等，主要限于本书的编写条件也暂不列入编选范围。

对于民族文学不列专卷的问题，是必须在这里特别说明的。贵州是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学是贵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贵州文学要在中国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优先发展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本书最初的编写提纲就专列了“民族文学卷”。但后来几经研讨，大家认为，单列虽有利于突出强调民族文学，但同时却割裂并削弱了各卷应有的分量，影响了各文学门类的完整性。因此决定不再单列“民族文学卷”，而在各卷中注意民族文学的比重，强调发展民族文学的重要性。事实表明，解放以来，贵州民族文学一直受到应有重视，得到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尤为迅速。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质量显著提高，在贵州

文学中居于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本书的编写采取个人执笔，集体研讨，反复修改，三级审定这样比较缜密的编审程序。各卷写得认真，改得认真；编纂组和主编审稿会对每部稿子的研讨也很认真。没有一部稿子是一次通过的，有的稿子还作了重大修改。全部书稿改完后再提交编委会全体会议审定。即便如此，疵漏仍在所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现在《贵州新文学大系》全书即将定稿。这是参加编写工作的全体同志几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本书从筹备到编写的整个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和各个方面朋友的关注和支持。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原任省委副书记）就多次参加研讨，对编写工作发表了中肯意见；他还随时过问编写进度，并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贵州人民出版社前总编张克是一位从本书倡议到编写的热心支持者；现任总编卢惠龙也积极参予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他们都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省文联党组一直关心本书编写工作，前后两届党组包括省文联主席、前任党组书记胡维汉在内的好几位党组成员直接参加了本书编写工作；现任党组书记杨长槐（原省文联秘书长）从1991年起给予的经费支持，对本书编写工作起到启动作用。

在艰巨的资料搜集工作中，首先要感谢广大作协会员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还要向提供查检报刊资料方便的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遵义图书馆、省文联资料室以及其他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寻找资料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1995年9月

《贵州新文学大系》总目录

引言	尹伯生
现代文学卷(上)、(下)	
现代文学扫描	
小 说	何积全
作品选(中篇节选 5 部, 短篇 32 篇)	
散 文	陈锐锋
作品选(104 篇)	
诗 歌	陈锐锋 何积全
作品选(88 首)	
中长篇小说卷(上)、(下)	
展开人生壮丽的画卷	王鸿儒
——贵州当代中长篇小说论评	
长篇小说列目(34 部)	
长篇小说选介(11 部)	
中篇小说选目(66 部)	
中篇小说作品选(14 部)	
短篇小说卷(上)、(下)	
上编(1949—1978)	
坎坷曲折的辛勤笔耕	何光渝 彭晓勇
作品选(21 篇)	
下编(1979—1989)	
走向现代的艰苦掘进	何光渝

作品选(28 篇)

诗歌卷

重读来路 张 劲

——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

作品选(278 首) 朱吉成

儿童文学卷

从起步到繁荣 戴明贤

——贵州儿童文学发展概述

作品选(93 篇、首)

散文卷

从平淡走向深沉 由单一趋于斑斓 艾筑生

——贵州散文四十年创作史论

作品选(散文 47 篇、杂文 36 篇、报告文学 10 篇)

文论卷

贵州新文学理论七十年 张建建 王良范

作品选(65 篇)

史料卷

贵州新文学大事记(1919—1989) 鲁令子 井绪东

贵州文化、文学社团

贵州文化、文学期刊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小传

贵州作家创作书目

贵州新文学大系

散文卷

(1949—1989)

艾筑生 编撰

目 次

从平淡走向深沉由单一趋于斑斓

——贵州散文四十年创作史论	(1)
散文选	(47)
杂文选	(254)
报告文学选	(341)

从平淡走向深沉 由单一趋于斑斓

——贵州散文四十年创作史论

艾筑生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也是散文的大国。《诗》《骚》并先秦诸子散文在中国文学始发期的双峰并峙，奠定了以后中国文学发展的流向。以散文而论，数千年的文学史可谓名家迭起，流派纷呈。司马迁是一代巨擘，唐宋八大家也各领风骚，晚明小品又是别一种风格。“五四”以来，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冰心等等更是影响深远。散文之所以拥有着广泛的读者，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裁写作自由，从中很能看出创作者的真性情，真品位。散文也不易藏拙，可以洋洋洒洒写大部头故事的人不一定能写好千把字的散文，其中需要真学问，真境界。因而，许多治文学史的名家都把对某一时期散文创作的考察作为衡评特定时期文学水准的重要标尺。基于同样缘由，《贵州新文学大系》专列《散文卷》。

无需赘说，我们“散文”的概念当然不包括有别于“韵文”的小说。然而与纯粹的“散文”比较也有着特殊的宽泛与包容，即是包括进了“报告文学”与“杂文”。这样的分类自然是基于贵州文学四十年的实际，当然从文学体裁的内在规律性上看也还是有着它的合理性。然而，毕竟“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在大前提相似之下又有有着特定结构上的区别，彼此承荷的约定俗成的文学负载也各有不同，这就使我们对贵州解放以来四十年的“散文”考察必须分三

大板块进行。

中国文学特定的美学传统以及建国以来文艺方针的特殊规定,都使得中国文学的创作相当直接地反映和表现特定的社会内容。整个中国文学创作如此,边远的贵州又焉能例外?这倒给文学史家的艺术考察带来某种便利,即是可以从文学作品对特定时期政治内涵,社会生活内容的反映见出特定的社会史,反之,亦可从政治史的轨迹寻出文学的脉络。这样,“史”的线索较易勾勒和把握。但困难也随之而至,这就是往往难以见到风格特异、堪称名家的流派和艺术个体。这使得艺术考察较为泛味。当然,我们还是力图在“史”的线索中寻求有特色的作家和作品,力求多给读者提供美的文学风景。

如同全国文学创作队伍的构成一样,贵州的文学队伍也包括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原在贵州的作家以及建国后培养的文学新军。“文革”前的十七年,贵州文坛自然是他们交相辉映。只是贵州甚少以散文名世的作家,“散文”的写作甚或是他们的砚边余墨,这就使得他们本以“小说”或“诗歌”驰誉贵州文坛,而我们的“散文”卷又要以他们以壮声威。这自然是贵州文学不尽如人意处。

在作了如上的陈述后,我们的艺术考察当然可以进入本卷的三大板块之一——纯散文部分的考察。

散文创作需学、识、情,这已经成为文坛的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散文是衡评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所达到的层次的重要标尺。真正的文学家必然是散文大家,譬如鲁迅、譬如巴金、譬如孙犁。

散文从本质上讲是拒绝矫饰的,那种以为词藻华美就是好文章实在是浅薄的见解。散文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人格。

因为这些,一切真正的作家都希望在散文的领域一显身手。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的散文创作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看来,吴纯俭发表于1950年12月出刊的上海《旅行杂志》的《多雨的贵阳》,算得上历史久远且颇具水准的散文作品。

吴纯俭的创作开始于四十年代中期、初期以诗知名。这篇散文，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文学素养。作者以恬淡的笔触渲染出边远山城的时令及气候的特征，着力于“多雨”的介绍。而其中又灌注一种柔蔓的情趣，突出了一个富于书卷气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尤其是看到，在河滨公园内，“你可以静静的看书，谁也不会来打扰你；书看倦了，你可以跳进杨柳湾去洗个澡，保管你会一身舒服。”昔日纯净的山城环境，真是令人遐想了。

大约是为旅行杂志撰文的关系，该文的后半部分以不短的篇幅较为详细地描绘了“贵阳八景”。依次为甲秀楼、翠微阁、鳌矶石、浮玉桥、涵碧潭、芳杜洲、海潮寺、武侯祠。作者细致传神地梳理八景的由来及各具的特色，引人入胜。其中两景至少在其时便残缺不全，如海潮寺，武侯祠。图片表明，武侯祠当时已作电厂（武侯祠也即观音寺，不同时期祀奉神祇不同），如今历尽艰辛，也难有旧时规模。因而，作者此文确实是弥足珍贵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吴纯俭不仅从旅游文化的角度介绍了边远的贵阳，还写出解放虽才数月（此文作于1950年8月），山城已是一片新的气象。因而作者闲适的感情，无疑是精神解放的成果，是对新的历史进程的轻快的颂歌。

同样，发表于1951年11月出刊的《旅行杂志》《黔川旅途速写》，也着意于解放前后（虽说解放也才年余）的根本性变化，以前作者留下的是一个避战乱的穷困学生的履痕，而今却是一个新中国建设者的目光，那浓烈的时代气息有如春风春雨，是雕琢不出来的。

如果说吴纯俭算得原贵州地区的作家代表，用心灵吟唱新生活的赞歌，那么邢立斌则是解放区培养的作家典型，潇洒地描绘新生活的美丽图景。发表于1954年4月号《西南文艺》的《在客车里》就是这么一篇不错的散文作品。

在这篇作品中，客车当然只是一个载体，新生活的浪花集中在

“我”、“北方老汉”、“侗家姑娘”身上。“我”是因工作下乡，“老汉”则是探望到新区工作的儿子，二人恰好同座。姑娘竟是从北京中南海表演侗歌回来，那见到毛主席的喜悦感染着同车的人。而当初，姑娘竟然是由区长写了保证条才敢出门哩！区长是谁呢？就是张老汉南下工作的儿子。当年参加革命也是怕离家哩，父母双亲也同样放心不下。而今，却是受侗家拥戴的毛主席的好干部了。

读邢立斌这篇散文，不由使我想起三十年后何士光的获奖作《远行》，后者之作要集中和深化许多，但构思之妙却是共同的。

邢立斌发表于1962年3月号《山花》的《野姑娘》，也是一篇不错的散文。所写的是土改时期一侗家姑娘在翻身解放的斗争中成长的事，刻画出倔强、果敢、泼辣的侗家姑娘形象。

五十年代，一批本地成长的文学新人加入贵州文学创作队伍，他们多以小说名世，但间或亦有散文佳作。韦翰（韦涵）、伍略、苏晓星、周青明等人就是这样。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中有好几位是民族作家。

伍略发表于1957年《山花》创刊号上的《小燕子》刻画娄山筑路工地青年女工的动人形象。灵巧而俏皮的姑娘，热爱着工人弟兄，不管艰难困苦、风雨暴虐，就像一只勇敢的燕子，在工地翻飞，为工人送药治病。在技巧上，用的是烘云托月手法，直接与间接交融，准确地凸现人物神态和她的事迹。

苏晓星有《春光里的花溪》（《山花》1957年7月号），此文以情真意美辞秀以及结构新颖取胜。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与秀丽的山光水色融为一体，名诗佳句似乎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尤其是第二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题外话：何尝是80年代的新发明）切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感染着读者，似乎也汇入了融融的春光里。此文三十年后入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数民族散文选》。

韦翰（韦涵）在五六十年代也写过不少散文特写。其中，发表于1959年1月号的《山花》的《独手姑娘》影响较大。作品描绘了年仅

18岁的女农具手章桃仙以一只手掌握了拖拉机的驾驶。这普通劳动者的巾帼风采感人甚深，留下了浓厚的时代印痕。

周青明亦有一些散文、特写问世。他与江萍合写的《砍树》入选《贵州十年散文特写选》，作品发表于1954年8月的《贵州日报》，形象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入社农民在涉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时的鲜活心态、矛盾的态度以及彼此的纠葛。风波的起因不过是个人的树苗遮住集体庄稼可能的阳光，虽是细雨微澜却折射出前进的步伐和滞后的留连的冲突。今天看来，也是饶有兴味的。

此外，本地成长的作者雷弟祥、吕笑、孙惠良在五六十年代也写过不少散文、特写。如雷弟祥的《闲话茅台酒》、《大方漆器漫话》，以文学笔法作工艺品和名酒的评介，集传说与工人的创造的精华，颇具可读性。吕笑的《战友》描绘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尽管没有见到要找的老首长，但革命同志为祖国富强忘我建设的激情却使得陌生的人一见如故。孙惠良的《川黔铁路纪行》也以火热的笔触记载了川黔铁路工地工人阶级的动人事迹。这些作品，多有诗一般的激情、火一般的言语，尽管今天看来有着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精神仍然是令人钦佩的。

田兵、涂尘野、微山、俞百巍、巴迅等人或则以诗，或则以小说、或则以剧本名世，皆是在建国前就先后参加革命的文艺家。五、六十年代，他们也各自有着散文佳作问世。

田兵到贵州后，绿水青山激动着诗人的情怀，他不由选择了散文、精雕细琢表达对黔地山川的情感。这一时期，他的纪游性散文较多，如发表于《山花》1959年4月号的《贵阳风景画》，9月号的《世人少知的热水谷》，1961年12月号的《黔灵山》，1962年9月号的《施洞五月赛龙舟》等。

将田兵的《贵阳风景画》与吴纯俭的《多雨的贵阳》作一比较就足以看出短短十年贵阳的巨大变化。田兵此文考证了许多史籍、方志、民间传说，文化品位不俗。